

红色经典的扛鼎之作《红旗谱》

张同俭

(保定学院 中文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红旗谱》是梁斌艺术创作的杰作,它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民经历的长期而又艰难的革命探索,作品不但展现了朱老忠由一个燕赵的慷慨悲歌之士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革命历程,而且艺术地还原了革命历史的原生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千姿百态、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作品将冀中人民的斗争置于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加以表现,并有意识地揭示了北方革命烽火同井冈山红旗的内在联系,从而使《红旗谱》成为表现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革命斗争的光辉史诗。

关键词:梁斌;保定作家群;《红旗谱》;红色经典;农民革命斗争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2-0001-05

梁斌(1914—1996)原名梁维周,河北蠡县梁家庄人。作为保定作家群的主帅之一,他集中体现了保定作家群第一代作家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先是战士,后是作家”。梁斌12岁考入县立高小,第二年就在一位身为地下党员的语文教师的影响下参加了共青团,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冬,曾参加了家乡农民群众开展的反“割头税”斗争。1930年考入北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河北省保定二师。保定二师1924年就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1932年二师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梁斌曾和同学们一起到工厂、农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后来在梁斌回家养病期间,反动当局竟下令解散学校驱赶学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六”惨案。这年9月梁斌的家乡蠡县又发生了北方当时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斗争——高蠡暴动。梁斌亲身经历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斗争,受到极其深刻的影响和感染。1933年学校被解散后梁斌失学而流入北平,曾参加过北平左联的活动,并第一次用梁斌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小说《芒种》。1934年他考入山东省立剧院学习戏剧。1935年返回北平,开始了文学创作。当年他在北平左联办的刊物《伶仃》月刊上发表了第一篇以高蠡暴动为题材的小说《夜之交流》,这也是人们所见到的作者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1937年梁斌在家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于1937年7月出任蠡县救国会委员。1938年至1939年间任冀中区“新世纪”剧社社长,1939年春任冀中游击队十一队政委。1940年任中共蠡县县委宣传部长。1947年任县委副书记。在抗日战争期间斗争极其激烈、生活极其艰苦、工作极其繁

收稿日期:2014-01-06

作者简介:张同俭(1945-),男,河北沙河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重的情况下，梁斌仍然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进行创作。1942年写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作品以高蠡暴动为背景描写了一个革命老人朱老忠和他的两个革命者儿子的英雄事迹。一个儿子叫大贵是高蠡暴动时的红军大队长，暴动失败后被捕，虽遭严刑折磨仍坚贞不屈，后在保定英勇就义，临刑前还站在汽车上向群众宣传革命。另一个儿子二贵是抗日战争中的自卫大队长，因打击走私活动得罪了大队副，结果这个混进抗日队伍中的内奸为包庇他的舅舅竟暗杀了二贵。这里的大贵、二贵都是根据梁斌高小时的两名同学的遭遇而写的，这也是梁斌作品中最早出现朱老忠、大贵、二贵的形象。

1942年，梁斌根据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的人物写了一部五幕剧《千里堤》。故事的背景已不是高蠡暴动，而是冀中1939年的大水灾。剧本中出现了地主冯贵堂。剧中主要写二贵给地主冯贵堂扛长工，团结雇工跟冯贵堂进行要求增资的斗争。冯贵堂在雇工起来和他斗争时，竟投降日寇，领着伪军扒堤放水，造成锁井镇一带的大水灾。剧本比小说的人物有所扩充，反面人物除冯贵堂外还写了李德才。

1942年秋，梁斌在晋察冀边区文联工作时，又把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扩展为中篇，仍用原名。后来在《晋察冀文艺》上发表时，编辑部将题目改为《父亲》。这部中篇约6万来字，分为13章，已经具备了《红旗谱》的雏形。作品中的朱老忠已是个阅历多、见识广的人。他下过关东，挖过参，淘过金。回乡安家后加入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捕，关在济南监狱里。这大概就是《红旗谱》中的运涛的遭遇。二贵在高蠡暴动中牺牲。三贵参加了抗日斗争，在区里当自卫大队队长时被内奸杀害。中篇里还出现了严知孝这人物。除此之外，梁斌在抗战期间还写了短篇小说《抗日人家》，五幕剧《五谷丰收》等，这些作品的创作不仅为后来扛鼎之作《红旗谱》积累了素材，奠定了生活基础，而且也已勾勒出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命运的基本轮廓，如朱老忠、大贵、二贵、张嘉庆、伍老拔、老套子、小顺子及冯贵堂、李德才等人物。

抗战胜利后，梁斌先在地方工作。1948年随解放大军南下。1949年在湖北襄樊任地委宣传部长，参加剿匪、反霸、土改斗争。1952年任湖北《武汉日报》社长。1955年调回河北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成为专业作家。1953—1956年底，完成《红旗谱》一至三部的初稿。1957年12月《红旗谱》第一部出版。第二部《播火记》和第三部《烽烟图》（初名《战寇图》）于1962年开始在《新港》连载。1963年第二部《播火记》出版。第三部《烽烟图》修改后于1983年出版。

1978年梁斌复出后，重新拿起被搁置了十多年的笔，创作并出版了反映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翻身记事》。晚年撰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还写了回忆录，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回顾和梳理。

从梁斌的生平可以看出，梁斌首先是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其次才是一位革命作家。他把文学创作当成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革命事业与文学创作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革命的斗争生活不仅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而且培养了他观察和认识生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为他创作出红色经典《红旗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梁斌被称为保定作家群的主帅之一，这不仅因为他是早在抗战之前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他创作了中国小说红色经典的扛鼎之作——三部曲式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红旗谱》（包括第二部《播火记》、第三部《烽烟图》）。这部作品是梁斌解放前文艺创作的集大成者，是他几十年心血的光辉结晶。书中的人物和故事从他的第一篇以高蠡暴动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就开始酝酿，在后来的《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父亲》及剧本《千里堤》、《五谷丰收》等作品中，人物形象逐步清晰，故事情节日趋连贯完整。因此，解放后当他开始正式进行《红旗谱》创作时，已是水到渠成、成竹在胸了。由此《红旗谱》出版后产生的巨大反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红旗谱》被称为中国红色经典的扛鼎之作，因为它是20世纪50年代产生的红色作品中结

构最宏伟、背景最广阔、斗争最激烈复杂、篇幅最长的辉煌巨著。作品以朱老巩大闹柳树林为序幕,通过锁井镇上朱严两家农民同恶霸地主冯兰池的斗争,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展现了发生在冀中大地上轰轰烈烈的反“割头税”斗争、二师学潮、高蠡暴动等英勇悲壮的革命斗争历史,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民经过长期而又艰难的反复探索,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闹革命、求解放的正确道路。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将冀中人民的斗争置于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加以表现,并有意地揭示了北方革命烽火同井冈山红旗的内在联系,因而使这部以保定人民革命斗争史为题材的作品,成为表现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革命斗争的光辉史诗。

第二,《红旗谱》被称为中国红色经典的扛鼎之作,还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朱老忠这个将燕赵风骨同革命英雄主义相结合的革命农民的典型形象。朱老忠作为生长在冀中平原滹沱河畔的农民,苦大仇深的人生经历使他从父辈那里就继承下来那种慷慨果敢、刚直不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燕赵风骨。正是这冀中大地上长传不衰的燕赵风骨,使朱老忠在家破人亡的灾难面前,将仇恨埋在心底,只身离乡背井、走南闯北。他在长白山挖过参,在黑河里打过鱼,在海兰泡淘过金。坎坷的遭遇扩大了他的视野,磨炼了他的意志,更坚定了他报仇雪恨的决心和信心。他的“出水才见两腿泥”的口头禅,就是这决心与信心最形象的体现。

正是怀着复仇的决心与信心,朱老忠历尽25年的人生艰辛,终于从关东回到保定。他抱着“世世代代要看着冯家倒下去”的强烈复仇意识回到故乡锁井镇。他为朋友两肋插刀,先是劝严志和打消闯关东的打算,鼓励他回家去同冯老兰斗争。接着又慷慨解囊为朱老明治眼。为了帮运涛凑足学费,他毅然卖掉自家心爱的牛犊,运涛入狱后,他带着荆轲刺秦王、英雄劫法场的念头代严志和到济南探监。

然而朱老忠同以往农民英雄根本不同的是,他是一个身历新旧民主革命两个时代的人物。如果说他在未走上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之前更多地表现出的是燕赵风骨在古代英雄身上体现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江湖侠义精神的话,那么他在党的教育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后,便将这种长传不衰的燕赵风骨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相融合,由一个燕赵的慷慨悲歌之士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当然,这种转变是长期斗争实践的启发和教育的结果。父辈们那慷慨悲歌式反抗的悲惨结局,自己走南闯北的坎坷经历,使朱老忠认识到,同冯家的斗争不能凭一时的义愤死打硬拼,必须从长计议,有时还必须“逆来顺受”。因此,当脯红鸟事件大贵被抓了兵后,义愤填膺的朱老忠曾扯起铡刀要去同冯老兰拼命,可父辈们的结局使他犯了思索。清醒后的朱老忠放弃了硬拼的做法,而是从“一文一武”报仇雪恨的长远打算顺水推舟送大贵当了兵,“让他去捋枪杆子”。这种转变表现了朱老忠已经超越了其父辈那绿林英雄慷慨悲歌式的反抗。

但是在没有找到党之前,朱老忠在同冯家的斗争中依然屡遭挫折,且常因力量不足而忧虑与困惑。正是在他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他从河南区张嘉庆领导的秋收运动中第一次看到穷人联合起来的伟大力量。后来他通过运涛结识了党的县委书记贾湘农后,感到有了靠山,有了前程。这时候,他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燕赵风骨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相结合,使他以崭新的面貌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是他率先勇敢地参加反“割头税”斗争,在门前安锅杀猪,向冯老兰挑战,并用三节鞭为游行队伍开道,冲进县政府迫使县长答应“暂时不交割头税”。保定二师学潮时,他出生入死支援营救被困学生,救出学潮的领导骨干张嘉庆。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朱老忠后来担任了红军游击大队长。这时他的心胸更开阔,斗志更旺盛,斗争经验更丰富。在柏树林商讨起义大计时他细心大胆,收缴冯老锡的枪支,显示了他的智慧和计谋,攻打冯家大院的胜利显示了他军事指挥的才能。

朱老忠是一个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的革命农民的英雄形象。在他身上既有鲜明的地域文化传统燕赵风骨的表现,又体现出民主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新的时代特色。鲁迅在20世纪

30年代曾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护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朱老忠的形象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式的艺术典型，是红色经典艺术画廊中最出色的艺术形象之一。

第三，《红旗谱》被称为红色经典的扛鼎之作，还在于它艺术地还原了革命历史的原生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千姿百态、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严志和同朱老忠一样深受地主冯老兰的压迫摧残，但其性格却与朱老忠迥然不同。他善良朴实、性格内向，有时又表现出软弱忍让、逆来顺受的特点。他和穷哥们一起同冯家打官司，败诉后输了一头牛，他虽不后悔，却又觉得无法向妻子交代，一个人闷声闷气地离家出走去闯关东，被朱老忠劝了回来。对运涛和贾湘农的接触，江涛到城里去读书，他开始都持怀疑的态度。连江涛从学校回来动员他参加反“割头税”斗争，他开始都不赞成，“算了吧，咱们别革什么命了”。严志和性格的这些弱点让人们看到了农民阶级在长期封建统治和小农经济束缚下的局限性，也使人们看到了在民主革命中教育启发农民觉醒的极端重要性。严志和正是在党的教育和朱老忠的帮助下，才从因一连串的打击而产生的痛不欲生的绝望状态中解脱出来，最终走上革命道路。严志和的觉醒形象地说明了革命斗争的实践是启发群众觉醒的最好的课堂，那种将启蒙与革命、启蒙与救亡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多么荒唐、不值一驳。

在作品刻画的农民形象中，还有性格孤僻狭隘的老驴头、思想有点糊涂的朱老星、日子过得十分贫困却整天嘻嘻哈哈的乐天派伍老拔等。正是这些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作品在表现农村生活的真实性和深刻性方面显得更有力度。

作为红色经典的扛鼎之作，《红旗谱》中还塑造了一批党的领导者和革命者的生动形象。县委书记贾湘农虽出身知识分子却能与农民打成一片，注意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尽管用笔墨不多，却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张嘉庆则是一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革命领导者的形象。他做事楞手楞脚、莽撞急躁，有点猛张飞的性格。二师学潮中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不肯撤出学校；高蠡暴动中动员土匪李霸泗参加，起义失败后被捕，后越狱逃跑，到门头沟挖煤。抗战爆发后回到锁井镇。他自作主张收编保定附近的地主武装，结果中了敌人的圈套。这个人物个性鲜明带有生活的原汁原味。其他革命青年像运涛、江涛、春兰、严萍、大贵、二贵等，他们既有共同的革命理想，也有各自不同处境、命运和各不相同的个性。作品正是在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中，充分展示了这些人物共同的追求和千差万别的个性特征。他们既不是生而知之的天才，也不是一贯正确、完美无缺的人物，却是那样生动真实、令人信服。

第四，《红旗谱》被称为红色经典的扛鼎之作，还在于作品那浓郁的冀中平原的地方色彩和鲜明的民族风格。作为小说序幕的朱老巩大闹柳树林一章，不仅以滹沱河畔那茂密的柳树林向人们展现了冀中平原上独特的自然风光，而且以铸钟为凭的公地揭示了在这华北平原的纵深地带，还残存着某些氏族社会的痕迹。当然这一情节主要是表现朱老巩这个鲁智深式的传统农民英雄的侠肝义胆，表现冀中大地上长传不衰的燕赵精神及其对朱老忠等人的影响。脯红鸟事件不仅从另一侧面展示了北方农村独特的地方风情和生活情趣，又为后面的故事发展作了铺垫。反“割头税”斗争中对年关集市场的描写，不仅生动地再现了北方农村过年的风俗民情，增加了作品的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又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小说结构上，作品也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善于通过生动曲折的故事、起伏跌宕紧张激烈的情节来刻画人物表现主题。整个作品以“平地一声雷”的护钟斗争为序幕，以反“割头税”斗争、二师学潮、高蠡暴动三大中心事件为主干，中间穿插了许多小的斗争和冲突，故事情节的安排疏密结合、有张有弛、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这种写法使人看到了作者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继承和借鉴。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表现出民族传统的深刻印迹。朱老忠这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农民

英雄,使人自然联想到张飞、鲁智深、武松乃至李逵的影响,而他参加革命后的表现又使人看到诸葛亮、徐茂公乃至吴用的影子。正是对古典小说的继承和借鉴使作品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

三

作为一部红色经典,《红旗谱》所反映的那段历史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了,作品的创作年代距今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们今天的环境不仅与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与作品创作时的环境完全不同了。因而,今天的人们再来读半个世纪前的作品,那感受与体会也就与当时的读者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引进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有人就利用这种不同时代读者的阅读差别对《红旗谱》为代表的红色经典来进行颠覆、解构,甚至贬低、否定、批判。

应当承认,在文学史上,有不少名噪一时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变迁被遗忘、被淘汰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2],因而就有了永久的艺术价值,就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被遗忘,被淘汰。梁斌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红旗谱》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尤其是在纪念梁斌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再来读这部作品,这种感受更加突出。

参考文献:

- [1] 鲁迅.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M]//鲁迅全集:第六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18.
[2] 列宁.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M]//列宁选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1.

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Red Flag*

Zhang Tongjian

(Chinese Department,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d Flag* is a masterpiece of Liang Bin's literary creation before liberation, which reflects Chinese farmers' long time tough struggles on the broa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great novel not only describes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of Zhu Laozhong turning to be proletarian warrior who was born in the land of Yanzhao chant in a heroic but mournful tone, but also artificially restores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revolution, successfully portrays many characters in different poses and with different expressions. *The Red Flag* explores the people's struggle in Jizhong area in the huge background of Chines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consciously reveal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orthern revolution war with Jinggangshan red flag, so that *The Red Flag* becomes a brilliant epic performa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of farmers.

Key words: Liang Bin; Baoding writers; *The Red Flag*; red classics;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of farmers

(责任编辑 崔福林)